



博源文库

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

# 三十年世界政治变迁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1979-2009)

( 1979-2009 )

王缉思 唐士其/主编



博源文库

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

# 三十年世界政治变迁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1979-2009)

---

( 1979-2009 )

王缉思 唐士其/主编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十年世界政治变迁(1979—2009) / 王缉思, 唐士其  
主编.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2.2

ISBN 978-7-229-04875-4

I. ①三… II. ①王… ②唐… III. ①国际政治  
—研究—1979~2009 IV. ①D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08239 号

## 三十年世界政治变迁(1979—2009)

SANSHINIAN SHIJIJE ZHENGZHI BIANQIAN(1979—2009)

王缉思 唐士其 主编

出版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别必亮 秦 琥

责任校对: 李小君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蒋忠智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川外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mailto: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9.5 字数: 480 千

2012年2月第1版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4875-4

定价: 5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 CONTENTS

三十年世界政治变迁(1979—2009)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1979-2009)*

- 导 论 三十年来的世界政治变迁/王缉思 唐士其/1
- 第一章 三十年来的美国政治变迁/朱文莉/38
- 第二章 当代俄罗斯政治变迁的走向及其历史和思想基础/  
关贵海/60
- 第三章 英国三十年的政治变迁/陈志瑞/81
- 第四章 三十年来法国政治若干变迁的回顾与分析/许振洲/118
- 第五章 三十年来德国政治的变与不变/连玉如/154
- 第六章 三十年来日本的政治发展/李寒梅/189
- 第七章 三十年来的印度政治发展/尚会鹏/220
- 第八章 三十年来的东欧政治变迁/郭 洁/243
- 第九章 三十年来的东南亚政治变迁/张锡镇/267
- 第十章 近三十年来的中亚政治变迁分析/吴 强/287
- 第十一章 三十年来西亚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发展/钱雪梅/307
- 第十二章 三十年来以色列、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的  
政治发展/王 联/338
- 第十三章 三十年来的拉丁美洲政治变迁/孙岩峰/396
- 第十四章 三十年来的非洲政治变迁/李安山/414
- 第十五章 北非三十年政治变迁/王锁劳/430

## 导论 三十年来的世界政治变迁

王缉思 唐士其

从1979年以来的30年间,整个世界经历了巨大而深刻的政治变化。由于过去的30年是全球化空前迅猛发展的时期,又是中国历史上与外部世界联系最为紧密的时期,研究这30年世界政治的变化,对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对展望未来中国的政治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和学术意义。

中国政治是世界政治的一部分,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同层面的、日益增加的复杂互动关系。30年前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进程,意味着它对自身在世界政治和地缘战略格局中实际及预期地位的调整,意味着它对西方精神、价值观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再评价,也意味着它在观念和制度领域的重新选择。一方面,作为人口占世界1/5的大国,中国国内的变化本身就改变着世界政治,同时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产生了不同形式的影响;另一方面,30年来的世界政治,特别是美国、欧洲、苏联/俄罗斯、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变化,都以各种方式牵动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依历史顺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化和保守主义的兴起,东亚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崛起和政治民主化,苏联和东欧的政治剧变,苏联、南斯拉夫及其他一些地区的民族分离和国家解体,“三股恶势力”(分裂主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在中亚等地区的猖獗,高加索和东欧、中亚等国家的“颜色革命”,以及古巴、朝鲜等国对本国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执著坚持,对中国政治既形成了一定的思想冲击,又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可以预见,中国未来的政治进程同世界政治的互动关系将进一步增强。

本文所指的“世界政治”,主要涉及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内部政治而非“国际政治”。国际政治的概念,更多涉及的是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国际战略格局和国际机制,如冷战及其结局、海湾战争、核不

扩散机制等。国际政治事件与国际格局变化与世界政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互关联,但国际关系本身不是本文的主要关注点。

过去30年的世界政治发展轨迹可以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半期,政治自由化和经济市场化是世界政治变化的基本趋势,以至于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çis Fukuyama)宣称历史已经“终结”;而在后半期,政治自由化和经济市场化受到新的考验和质疑。那些已经采纳了自由民主制的国家不得不通过艰难地探索民主的“本地化”以巩固和完善其基本制度,“市场原教旨主义”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批判,曾经作为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市场化意识形态基础的新自由主义不断遭到质疑。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公共社会迅速发展,非传统安全问题(环境、能源、粮食、公共卫生,等等)凸显,宗教与民族问题政治化,以及各种极端主义的兴起,都对各国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并且重新定义着世界政治的内涵。3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但在这个时间段内,世界历史似乎已经实现了一次螺旋式的上升,完成了某种形式的“轮回”,虽然绝非降落在原点上。它不仅体现了世界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向,也体现了各国政治结构与政治过程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甚至可以说,世界政治真正的多样化过程才刚刚开始。总之,与冷战时期相比,世界政治变得更为多姿多彩,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变得更为不确定。

30年世界政治的变化,表现在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政治制度、结构和过程领域、社会经济政策领域以及民族和宗教领域,等等。虽然世界各国的历史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政治制度差异很大,但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可以发现,在这段时间内,各国和地区的政治变迁又表现出某些相似性甚至趋同性。通过对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在这30年中政治发展过程的系统分析,总结世界政治发展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可以帮助我们澄清一些以往可能产生的错觉,对政治生活的内在规律获得更为深入的理解,更有把握地预测世界政治未来的发展方向,在此基础上设想适当的应对之策。

### 一、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

在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西方国家过去30年的一个基本趋势是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这一趋势与西方社会的进一步自由化同步,表现为各种亚文化群体大量出现,社会宽容度扩大,少数民族和族裔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受到尊重,等等。美国政治学

家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认为,在主要西方国家公民的基本价值体系中,对生态环境、人权以及战争与和平这类所谓的后物质主义价值的关注正在替代原来对与阶级问题相关的物质主义价值的关注,他因此相应地把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时代称为“后物质主义”时代<sup>①</sup>。与之相适应,建立在阶级分野基础上的以左右对峙为基本特征的传统政治格局也开始向多元化、碎片化的方向转变。

当前,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或者说多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已经成为西方国家文化政策的指导原则,西方社会正变成一种在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方面“多元异质”的社会。这一指导思想的出现,与西方社会人的种族、语言、宗教、文化的多样化相适应。几十年来,为数众多的新移民从拉美和亚洲涌入美国和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亚裔人口快速增加,来自北非、中东(特别是土耳其)、东南欧的大批移民进入西欧。此外,新移民与少数族裔的出生率大大高于北美、西欧的白人。这种社会变迁不但改变了发达国家的人口结构,也将同西方传统不同的宗教、文化、价值观带入发达社会。如果西方国家不能在一定程度上宽容以至吸纳来自异质社会的文化价值观,西方社会就会出现更大的分裂以至动乱,西方政治思想也将丧失其生命力和主导地位。

正是在此意义上,美国总统克林顿于1997年表示:“如果能够证明我们可以在欧洲文化不占支配地位的状况下生活,那么这就将成为美国的第三次伟大革命。”非洲裔的巴拉克·奥巴马在2008年当选美国总统,而且是以带有自由思想色彩的民主党人的面貌登上历史舞台,这可以被视为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文化价值观念向多元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可以观察到一种思想和文化意识形态多元化的进程。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的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在客观上推动了思想和价值自由的追求,虽然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种追求只能体现为受到批判和压制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1975年

---

<sup>①</sup>Cf., Ronald Inglehart, *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Ronald Inglehart,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7—8月苏联和东欧七国签署《赫尔辛基最后决议》(*Helsinki Final Act*)<sup>①</sup>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此后,基本上只能存在于地下状态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首先在一些东欧国家,比如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公开化,继而出现了越来越强烈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呼声。

1985年以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正式提出“改革”和“公开性”的口号,全面放弃党和国家对思想和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此举极大地推动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多元化进程。虽然改革者的初衷是让社会主义思想观念在与其它思想的自由竞争中获得新的生机与活力,但思想自由和多元化的进程在苏联东欧国家一旦开始,便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进一步加速了这些国家的政治自由化,最终汇集成导致苏东剧变的巨大力量。

当前,在思想和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原苏联与东欧地区已经基本上认同于西方国家。西方一些主要的亚文化与反文化现象,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它们的对应物。自由主义在这一地区大有“一统天下”之势。俄罗斯的自由主义思潮在20世纪90年代占了上风。虽然到21世纪初,要求恢复俄罗斯国家传统和民族心理的“本土主义”抬头,强国意识复苏,社会主义思想仍然占有一席之地,思想更加多元化,但是,维护民主和人权,保障公民的政治自由、经济自由、新闻自由的认识,已经在俄罗斯和东欧地区扎根。

值得注意的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这段时间内思想和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另一种类型的“多样化”。曾经被冷战结构所分裂的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起,其思想和文化意识形态逐渐开始摆脱机械、僵化地皈依某种教条的状态。无论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教条,还是西方式的自由主义教条,都在不同程度地受到扬弃,而各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某些要素重新在国家公共生活中得到承认乃至推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趋势与西方国家内部出现的“文化多元主义”具有一致性,甚至也可以说得到了后者的促进与推动。但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民族文化的复兴与西方的自由主义和文化

---

<sup>①</sup>又称《赫尔辛基协议》、《赫尔辛基宣言》,是参加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35个国家签署的文件。签字国包括除阿尔巴尼亚和安道尔以外的所有欧洲国家,以及苏联、美国和加拿大。该文件的主题是缓和东西方关系,但也责成签字国“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思想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为向苏联、东欧国家宣传西方价值观开了绿灯。



多元主义又表现出某种张力。换言之,非西方国家出现的文化多元现象并不必然与西方主流的价值观念相一致,甚至可能与后者相冲突。这一点在伊斯兰国家有明显的体现。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具有某种象征性的意义。它不仅是一场政治运动,更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标志着传统的伊斯兰文化对西方世俗主义、物质主义文化的反叛。以此为起点,众多的伊斯兰国家进入了一次“再伊斯兰化”的过程。这意味着另一种意义上的“自由化”,即非西方国家在思想和文化领域摆脱西方主导的“自由化”,但这种“自由化”所指的方向,恰恰挑战着西方版本的自由主义与自由秩序。

因此,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自由化既不意味着“同质化”,也不可能无条件地保证各种思想文化因素的和睦共处,更不能说自由化本身就意味着发展与进步。在西方国家,由自由主义所推进的文化多元主义在保护少数民族和各种亚文化群体的权益方面固然取得了不少实质性的成果,进一步增加了社会的自由度与宽容度<sup>①</sup>,但由此导致的价值和文化相对主义以及极端的个人主义,也开始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正如美国著名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rty)所言: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为妇女、非洲裔美国人和男女同性恋者做了很多好事……但是有一个问题:他们不是爱国主义的……他们否定国家认同,否定民族自豪感”<sup>②</sup>。另外还有学者认为,文化多元主义实质上具有反民主的倾向,它因对各种少数群体的保护而背离了作为民主政体基本原则的多数主义,进而把国家分裂为一个由各种少数构成的社会。这些群体分别遵循各自的信念与偏好,最终将把国家推向分裂<sup>③</sup>。

德国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也强调指出:文化多元主义具有自我封闭的特征,它会极大地压缩政治公共空间,同时无助于解决社会中大量存在的矛盾与冲突。特别是在美国,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受到几乎是无条件的保护和尊重,由此形成林林总总的“政治正确”标准,并且在实际上造成大量公共言论的禁区,政治行动

---

①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通过司法判决和国会立法,规定对同性恋者的歧视违反宪法;另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甚至已经使同性婚姻合法化。

②Richard Rorty, *Achieving Our Country: Leftist Thought in Twentieth-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5.

③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7, pp. 31-32.

的可能性与政治生活的想象力大受限制。美国政治学家桑德尔(Michael Sandel)针对这一现象指出:“民主政治的公共生活不可能长时期内维持一种因在道德问题上不着边际而形成的温文尔雅的假象,……当政治论辩失去道德色彩的时候,一种要求公共生活具有更广泛意义的压力就会以人们意料之外的方式表达出来。道德上的多数与基督教右派会以狭隘的、不宽容的道德主义覆盖荒芜的公共空间,自由主义退出的领域也会被原教旨主义侵占。”<sup>①</sup>

秉承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思想传统的新保守主义者认为,这种思想和文化领域过度自由的倾向导致了人们道德水准与公共精神的严重下降,文化多元主义已经蜕变为文化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西方社会面临着失去其主流的核心价值规范的危险,而自由主义也将丧失其“绝对的基础”<sup>②</sup>;另有保守主义者不无根据地担心,无限制的自由化与价值观念的相对化,将威胁到一个民族的国家认同和政治忠诚。美国已故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甚至因此提出了“我们是谁”的疑问<sup>③</sup>。

事实上,面对无限制的自由主义可能导致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西方一些即使态度不那么极端的人士也深感忧虑,他们热切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新的思想文化战略,以实现思想文化自由与共享价值观念的结合。这方面代表性的理论,包括交往行动理论(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新共和主义(new republicanism)和共同体主义(communitarianism),等等。在美国,一方面是价值和文化的多元主义不断取得进展,另一方面却是从里根到两位布什政府,保守主义在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取得越来越大的影响。美国政治因这两种倾向的冲突与角力而在某种意义上保持了总体的平衡,但也并非不具有“失衡”的危险性。可以肯定的是,奥巴马的当政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这种角逐,甚至也不能排除这两种政治原

---

①Michael Sandel,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2nd edition,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16-217.

②Leo Strauss, “Relativism”, in Helmut Schoeck and James Wiggins (eds.), *Relativism and the Study of Man*, Princeton: Van Nostrand, 1961, p. 140.

③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则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发生激烈冲突的可能<sup>①</sup>。这意味着,当自由主义在西方甚至世界的大多数地区大获全胜的时候,它的内在缺陷也已经异常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第三条道路”则是在过去十来年中出现的调和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价值的理论与实践。在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于1998年出版了《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并且成为布莱尔工党政府的执政纲领。之所以需要探索“第三条道路”,是因为一方面人们已经意识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后福特生产方式的普遍采用、信息时代的来临、经济全球化,等等),西方国家传统的社会经济政策模式已经不可能继续维持,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福利国家与政治民主在历史上形成的结合,这一西方在现代化过程中整合了国民国家并使其合法化的模式已经注定要崩溃了”<sup>②</sup>;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对基本的社会公正以及人的价值

---

①美国政治学家沃勒斯坦对1999年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就弹劾克林顿总统进行表决的情况进行过如下评论:“赞成弹劾总统的共和党一方,是清一色的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白人,几乎全部都是来自南方,除一人外全部是男性。反对弹劾总统的民主党一方,有天主教徒,犹太人,黑人,妇女,一名同性恋者,一名来自南方的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男性白人。从这种激情中难道看不出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白人男性因感到自己在美国社会中的角色业已降低而发起的造反吗?”(转引自[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288页。)显而易见,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冲突在美国已经具体化为种族的、地域的、宗教的和党派的冲突。亨廷顿在其“文明冲突论”中提出的所谓的“文明的断层线”已经在美国社会内部隐隐约约地浮现出来。

②Ulrich Beck, “What is Globalization?”, in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eds.),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s Read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Debate*, 2nd edition, London: Polity Press, 2003, p. 100. 英国政治学家约翰·格雷对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传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面临的困境进行了理论上的说明,他认为:“社会民主体制以封闭性的市场为前提。资本的流动由于固定的或者半固定的汇率而得到控制。社会民主的诸多核心政策在开放经济中会难以为继。这一点不仅适用于战后由赤字财政支持的全员就业与福利国家,同样也适用于在平等方面社会民主式的治理。社会民主主义的所有正义理论(比如说约翰·罗尔斯的平等主义理论)都以封闭经济为前提。”因为“只有在封闭的分配体系中,我们才能知道这些理论所提出的正义标准是否得到了满足,更具体地说,只有在封闭经济中,平等主义的原则才能得到实施”。他的结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是采用现有的制度与政策它能否继续生存?答案是否定的。现在面临的挑战是接受看上去不可避免的新一波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还是采用一种能够控制市场的力量并且满足人类需要的政策。”(John Gray, “The Passing of Social Democracy”, in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eds.),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s Read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Debate*, 2nd edition, London: Polity Press, 2003, p. 330.)

的否认也为人们所不取。

“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就是希望在新自由主义和传统的福利国家主张的一系列相互对立的价值之间寻找某种折中的可能性。具体来说,它主张兼顾个人和群体的价值即实现个人自由与社会团结的统一,在个人自主、个人责任与社会公正之间寻求某种新的平衡,同时强调超越单纯的政治党派划分与对立,注重从官僚式的政府集中管理向多层次治理的转变,提倡灵活、高效、民主的政治体制,追求更为公平有效的、多元化的社会福利体系,等等。

“第三条道路”的提法很快就流行于欧美各国,并且得到积极反响。在探索“第三条道路”方面,荷兰与丹麦可以算得上是成功的例子,另外美国的克林顿政府也被视为这一理论的追随者<sup>①</sup>。但是,对“第三条道路”的批判也很多,最主要的就是认为它不过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新自由主义。在资本与民众之间,它明显地倾向于前者,因而最终仍将屈从于资本的压力而不可能真正体现广大民众的利益。有人甚至认为,“第三条道路的领导人确实要求商界和权力机构做出负责任的行动,他们借口这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但是,他们从没有像要求劳工、贫困以及弱势阶层那样苛刻地要求商界人士。”其结果是,“在追求贸易优势的过程中,环境保护、消费者利益和劳动力标准都已完全不是布莱尔、克林顿的决策范围。”<sup>②</sup>

对自由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不仅仅存在于西方国家。从叶利钦执政后期开始,俄罗斯就逐渐与自由主义拉开距离,其他转型中的东欧国家也越来越多地对自由主义进行反思,至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本土文化与思想因素的复兴现象也应作如是观。事实上,民主化和自由化本身就促进了非西方国家本土文化的发展。总的来说,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又导致了全球性的地方化

---

<sup>①</sup>克林顿曾经表示:“我们的政策既不是随便的,也不是保守的;既不是共和党的,也不是民主党的。我们的政策是新的,是与以往不同的。是介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参见傅殷才、颜鹏飞:《自由经营还是国家干预——西方两大经济思潮概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73页。

<sup>②</sup>参见欧阳景根:《背叛的政治——第三条道路理论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82页。

(glocalization)<sup>①</sup>以及不同文化因素的直接接触与冲撞,以至于亨廷顿在一些人欢呼“意识形态的终结”时警告人们要正视“文明”冲突的可能性。当然,亨廷顿的错误在于,他过于简单地把以宗教界定的“文明”视为一种同质而封闭的整体。事实上,在每一种文明内部都可以发现相互冲突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反过来,每一种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都可以在所有的“文明”中找到它们的支持者。

简言之,在过去30年的思想文化领域,全球范围的意识形态冲突远未终结。但是,这种冲突的内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俄国十月革命到冷战结束的70多年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列宁主义同自由主义的对立是意识形态冲突的主线,并且分别由苏联和美国所代表。随着苏联的衰落与最终解体,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对传统观念的冲击,个人自由、个人权利、思想多元、文化多元的观念深入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球意义上,自由化与多元化的对立面不再是以国家为名的赤裸裸的思想专制,而是以软性的社会凝聚力、社会认同、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宗教认同等为核心价值的思想。实现个人价值与维护社会稳定、共识和团结之间的紧张,也就是自由和秩序的矛盾,在每一个国家都顽强地表现出来。这一意识形态矛盾的性质,决定了对立双方都无法建立有类似冷战时期两大阵营那样具有代表性的、强有力的跨国组织。同时,国家作为意识形态或宗教符号的现象,也正在退出历史舞台。

## 二、国家的社会经济职能——自由化及其界限

1979年和1980年,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分别开始主政英国和美国。他们的上台,标志着西方国家战后建立在凯恩斯经济学基础上的国家干预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以及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作为社会经济政策指导原则的时代的开始。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在国家全面管理和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现代社会对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回归,它既是一种经济理论,也是一种社会政治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是造成西方国家经济停滞、社会丧失活力以及政治官

---

<sup>①</sup>Jan Nederveen Pieterse, "Globalization as Hybridization", in Frank J. Lechner and John Boli (eds.), *The Globalization Reader*, Malden an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0, p. 102.

僚化等弊端的根源,主张国家应该尽可能地约束自己的职能范围,让自由市场充分发挥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协调作用,并且刺激每一个人的积极性与主动精神。在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是非国有化、减少国家的经济干预(由财政政策转为货币政策)、减少税收、削减社会福利等。其中,私有化和减税两个方面的“成果”尤为明显。在英国,有45家大型国有企业被私有化,其从业人数占英国国有企业从业人数的2/3,而在税收方面,基础税率和最高税率分别从33%和83%下调到25%和40%;在美国,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分别从50%和46%被消减到28%和34%,同时政府的财政支出也逐年下降<sup>①</sup>。放松金融监管,也是从撒切尔和里根时代开始的。其他西方国家紧随英美之后。同时,为了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西方国家普遍对有组织的劳工运动采取了高压措施。

基于对本国体制弊端的反思,随着对外部世界的逐步开放,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几乎与西方国家同步,也先后开始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改革的根本原因,自然是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活力尽失,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但是,绝大多数的原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如中国那么成功。它们的改革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果,基本失败的经济改革和社会经济状况的恶化,反过来又迫使这些国家走上更为激进的政治和经济变革,并且最终导致了政治制度的剧变。苏东集团解体之后,这些国家成为新自由主义(或曰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试验场。它们普遍采用被称为“休克疗法”的经济转轨方式,即以最快的速度放开价格,推行私有化,开放资本和金融市场以及实行贸易自由化等,其基本理念是:“中央计划者一旦撤出,市场即刻就会出现。”<sup>②</sup>客观上说,针对苏联东欧积重难返、各种复杂关系十分难以理顺的经济形势,“休克疗法”并非毫无作用,至少是迅速稳定了各国的经济形势,特别是遏止了恶性通货膨胀,而且使这些国家的经济体制一步到位地转变为自由市场经济。但是,这一成就的巨大代价是苏联和东欧国家无一幸免地陷入了一场持续时间长短不一的经济衰退,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贫富分化与贫困化。

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受到新自由主义不同程度的冲击,其中以拉丁美洲尤为突出。拉美各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先后大力推

<sup>①</sup>见本书第一章、第三章。

<sup>②</sup>引自本书第八章。

进经济开放,特别是资本自由化,因而很快陷入了巨额的债务危机。为克服危机局势,在美国主导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美洲开发银行和其他一些机构共同提出了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指导拉美经济改革。“华盛顿共识”要求拉美国家进一步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推动金融和贸易自由化、削减公共福利开支、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等,条件则是向它们提供金融和货币方面的支持。不幸的是,“华盛顿共识”在拉丁美洲国家的实践结果基本上是灾难性的。由于各相关政策严重削弱了拉美各国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控制能力,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形势迅速失控,经济停滞与大众的贫困化之间形成了一种危险的恶性循环:经济停滞导致贫困的普遍化,贫困化致使国内市场萎缩,市场萎缩推动经济结构畸形发展,畸形的经济结构又进一步加剧贫困化。

非洲的经历与拉美有相似之处。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一些非洲国家也陆续展开了私有化进程,并且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基于“华盛顿共识”的“结构调整政策”(SAPs)。虽然对这一政策调整的成果尚有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它的实施基本上是失败的。一方面,上述政策导致了非洲接受的直接投资的减少,从而使其经济发展失去了最重要的资金支持。仅在1994—1995年间投往非洲的直接投资就下降了27%,实际投资总额仅为21亿美元,即世界投资总数的3%<sup>①</sup>。另一方面,该项政策把非洲国家现有的资源导向生产用以偿还债务的出口产品,特别是原料与经济作物,其结果是迅速恶化了非洲的自然和资源环境,导致非洲经济畸形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出口额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0%,远高于经合组织成员国的19%,但这些国家并没有因此而走向富足<sup>②</sup>。因此,也有人把这一“结构调整政策”称为“反人民的,甚至是灭绝性的”政策<sup>③</sup>。一个基本事实是,非洲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困化最集中的地区。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

①Bernard Cassen,“To Save Society”,in Frank J. Lechner and John Boli (eds.),*The Globalization Reader*,Malden and 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 Ltd.,2000,p.14.

②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Globalization with a Human Face”,<http://hdr.undp.org/reports/global/1999/en/>.

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第三世界的蹂躏》,转引自[美]迈克尔·坦泽尔:《经济全球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影响》,见李其庆主编:《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页。

2005年的《人类发展报告》统计,世界上最贫困的50个国家全部集中在非洲<sup>①</sup>。

从总体上看,在新自由主义推动下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和经济自由化,是延续至今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基础;反过来说,经济全球化的制度体现就是全球范围内的新自由主义化<sup>②</sup>。一方面,随着冷战的终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东西方对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分割被打破;另一方面,世界各国或主动,或被动地向资本和市场不同程度地让出了诸多原先由政府控制的领域,各种关税和贸易壁垒被打破,国与国之间商品与货币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自由度不断增加,各国贸易依存度也不断增加。作为其结果,国际经济联系日益紧密,整个世界经济开始融为一体。因此,虽然不能否认交通与通讯技术在过去几十年的飞跃发展为全球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但仍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推动经济全球化方面,新自由主义“功不可没”。

尽管在过去30年的大多数时间里,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表现出凌厉的进攻态势,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时至今日,完全可以说这种政策已经走过了它的黄金时期,政治与经济关系中的固有逻辑再次顽强地表现出来。首先,西方国家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发源地,曾经不遗余力地向全世界输出这种社会经济政策,但就在这些国家,新自由主义的逻辑也从来没有不带折扣地完全贯彻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在社会政策方面,虽然西方各国一再宣称要削减福利,但实际上很多国家的相关支出基本上

---

<sup>①</sup>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5,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t a Crossroads: Aid, Trade and Security in an Unequal World*, [http://hdr.undp.org/reports/global/2005/pdf/HDR05\\_complete.pdf](http://hdr.undp.org/reports/global/2005/pdf/HDR05_complete.pdf). 虽然从1995年开始,非洲国家的经济出现增长,但这种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结构调整政策”,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人们一般倾向于认为,这一时期非洲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三个方面:原材料价格的上涨、非洲国家的政治趋于稳定以及南方国家,特别是中国开始向非洲大量投资。

<sup>②</sup>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报告,从1991年到1997年间,总共有151个国家对其国内经济体系进行了调整,其中136个国家调整的方向就是自由化,只有15个与之相反。Cf., Richard Langhorne, *The Coming of Globalization—Its Evolution and Contemporary Consequence*,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 16.



还是稳中有升<sup>①</sup>。另外,面对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西方各国也没有对本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撒手不管。在美国,所谓“战略贸易学派”的学者就为政府的经济干预职能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凯恩斯主义的理由,即塑造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克林顿政府时期,这一学派的学者大量进入联邦政府,使他们的政策主张成为政治实践。1993年,克林顿政府公开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发展计划,并且在此后通过了旨在推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电信法》。在此期间,美国政府为推动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共投入了760亿美元发展制造技术、高速计算机、通信设备、原材料和加工技术以及生物工程和基础科学等项目。政府在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开发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奠定了美国在这些领域的绝对优势。有一种观点甚至认为,正因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推行这种“军事凯恩斯主义”政策,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形势才再度得以改善,而国家的财政能力也才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得到进一步加强<sup>②</sup>。美国的此类做法很快得到其他西方国家的效仿,这表明,“在不断扩展的国际化与全球化过程中,国家各种形式的干预,在许多关键的产业和经济发展领域都是一种广泛而持久的现象。”<sup>③</sup>

在日本,1982年中曾根康弘担任首相,也举起了与“撒切尔主义”、“里根主义”类似的旗帜,即中曾根所称的“新保守主义”。在经济上,中曾根时期把变革政府功能、提高效率和应变性、减少财政支

---

①比如,欧盟国家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百分比1980年时平均为24.3%,到1990年上升到25.4%,1997年又进一步上升到了28.2%(李军鹏:《政府社会管理的国际经验研究》,载《中国行政管理》,2004年第12期)。另外,西方主要国家政府税收水平的变化也表明政府职能仍然有增无减。据统计,2001年时世界主要国家政府的税收在其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与10年前相比是上升了而非下降了。世界上对资本最开放的两个国家丹麦和瑞典,其税收水平也是最高的,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Roger King and Gavin Kendall, *The State, Democracy and Globalization*, Hampshir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p. 154-155)。有研究甚至证明,福利国家的社会开支还在继续以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增长(Jens Alber, “Social Dumping, Catch-up, or Convergence? Europe in a Comparative Global Context”,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Vol. 10, No. 2, 2000,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p. 107)。

②参见[德]卡尔·格奥尔格·齐恩:《全球化的获利者与失败者——20世纪最后25年的经济发展》,载[德]乌利希·贝克等著:《全球政治与全球治理》,张世鹏等编译,北京:中国广播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页。

③R. J. Barry Jones,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Globalizat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State*,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66, 67.